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研究”（项目批准号：11BKS056）资助出版

网络意识形态 领导权研究

杨文华 何翹楚 著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yber Ideology



東北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项目批准号：11BKS056）资助出版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

杨文华 何翹楚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杨文华 何翹楚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 / 杨文华, 何翹楚著. —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517-1659-8

I. ①网… II. ①杨… ②何… III. ①互联网络—意
识形态—领导权—研究 IV. ①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1592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3655(总编室) 83687331(营销部)

传真: 024-83687332(总编室) 83680180(营销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28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5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振军 王 程

责任校对: 李 佳

封面设计: 潘正一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1659-8

定 价: 58.00 元

序

意识形态领导权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加强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危险，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前瞻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均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全面渗透，由此导致了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杨文华博士的新作《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立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题，对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关注和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性思索。

本书的价值之一，是从理论层面上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给予了有力回应。当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尼葛洛庞蒂的“网络意识形态终结论”正是这一理论的变种。他认为，网络空间完全没有物理边界，是一个平等、自由、公开的领域。如果说网络本身还体现出什么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一致、共同的网络信念——自由。针对意识形态研究的这一动向，本书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了反驳。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的组成部分，它以观念的形式反映社会存在。考察社会意识形态，应将其放到社会实践的总体化过程中来进行。网络时代，社会利益差别、阶级差别依然存在，反映该基础的思想差别也依然存在。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没有终结。事实上，在信息技术推动网络

“地球村”的变革中，全球空间利益盘根错节，推动地缘政治向网络空间延伸，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所。

本书的价值之二，是从实践层面上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进行了深刻思索。在突尼斯变局引发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中，美国的Twitter网络、Facebook网站、黑莓手机、Youtube网站等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些新兴网络媒体已成为西方国家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起到了一呼百应、聚集放大、扩散蔓延的传播效应，充分显示了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着眼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本书认为，在宽松的网络环境中，一些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网络文化渐渐汇聚，表达情绪、发泄不满，推动网络舆论压力向现实社会压力转化，施行着自网络社会向现实社会的全面操纵，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严峻挑战。

本书的价值之三，是从操作层面上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进行了具体探究。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初期，针对蜂拥而至的西方社会思潮引发的思想危机，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他分析了任由错误思潮泛滥的危害，提出必须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强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必须加强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此，本书提出，它应通过四大安全机制得以实现，即信息预警机制、舆论疏导机制、意识形态自卫机制、红色文化抵御机制。当然，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是防卫问题、抵御问题，还应体现更强有力的进攻和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生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终将战胜腐朽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这也是我作为评论者的一点看法。

杨文华是我的学生。她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对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了扎实的学习。《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研究的一部论著，体现了她良好的理论功底。面向时代发展，解决现实问题，是理论研究的不竭源泉和永恒价值。这也是我向学生们阐释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希望她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潜心研究，关注现实问题，不断向学术前沿迈进。

王伟光*

2017年2月24日

* 王伟光：男，汉族。1950年2月生，山东海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价值	1
二、研究综述	2
三、研究方法	4
四、研究框架	4
第一章 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沿革	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9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9
二、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	15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19
一、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20
二、邓小平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26
第三节 国外学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34
一、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35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	39
第二章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新特征	49
第一节 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规律	49
一、意识形态网络生存的可能	50
二、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特点	52
第二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评判的新标准	55
一、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	56
二、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同度	65

三、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广延度	78
第三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防卫的新态势	91
一、网络意识形态威胁的多元性	91
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扩散性	94
三、网络意识形态危机的临界性	98
四、网络意识形态攻防的非对称性	99
第三章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略价值	104
第一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国家利益中的全局价值	104
一、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国家生存	105
二、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国家发展	109
三、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国家稳定	112
第二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执政安全中的核心价值	115
一、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执政党的发展	116
二、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执政体制的稳固	119
三、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执政认同的获得	121
第三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文化发展中的长远价值	124
一、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文化经济的发展	124
二、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文化政治的发展	130
三、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文化思潮的发展	134
第四章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	138
第一节 信息技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38
一、网络信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39
二、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41
第二节 网络传媒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43
一、网络论坛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44
二、网络博客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59
第三节 网络舆情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72
一、网络语言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73

二、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90
第四节 网络思潮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	194
一、网络文化的游戏主义意向	194
二、网络文化的自由主义神话	196
三、网络文化的技术主义逻辑	199
四、网络文化的全球主义迷思	201
五、网络文化的非意识形态化警示	203
第五章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策略	208
第一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方略的确立	208
一、坚持网络文化交流中的开放性原则	208
二、坚持网络冲突中的自主性原则	212
三、坚持网络文化发展中的正当性原则	217
第二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机制的建构	224
一、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	224
二、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	226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卫机制	227
四、红色文化的抵御机制	230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1

绪 论

与现实领域相比，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隐蔽而尖锐。西方国家借助其所占据的技术优势，不断加大对网络信息的引导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西方文化领地在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大，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话语、学说开始兴盛，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威胁。

一、研究价值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争斗异常激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严峻挑战。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格局及其主动权理论的运用。马克思区分了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安全机制。他认为，意识形态安全由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任何阶级或集团要维护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巩固其政权。列宁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系统论证了意识形态“灌输论”。他说，无产阶级本身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斯大林论证了思想的伟大意义：“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把人们联合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其次，本研究是对我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面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歪曲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进行了斗争，科学地评价了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思想在网络时代具有更为深刻的指导意义。

再次，本研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借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只有知识分子已经有机地是大众的知识分子，已经解决并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原则与问题连贯成一体，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稳定与思想的有机性质。保持文化上的自主创生能力，通过知识分子传达和阐释意义，是文化战略的根本所在。这一思想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本研究是对网络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积极回应，是对网络空间中涌动的各种思潮的深度关注。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西方发达国家对它的攻击就从未停止过。网络时代，他们将其在长期文化冷战中积累的意识形态渗透经验，与其所把持的尖端网络技术，在网络普及化及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汇聚成为新的、更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在这种形势下，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的非主流观点与社会转型引发的现实矛盾均存在被激活、放大的可能。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应对网络时代来自内部与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

二、研究综述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历史终结论”者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战胜社会主义的极大可能。早在1929年，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意识形态是狭隘的，主张用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乌托邦代替意识形态，他阐述了“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的消失”的过程：“政治学逐渐被归为经济学，这一点至少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有意识地否定过去和历史时间观念，有意识地漠视各种‘文化理想’，这一切难道不应该看作是所有形式的乌托邦主义也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吗？”

1960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一书，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贝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的分析迥然不同，国家不再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是日益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工人阶级的反叛精神不复存在，其政治活动毫无进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历史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其社会革命学说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及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终结：“未来已经到来，一切都已经到来，一切皆在于此，人们不再有任何期待。”认为，不仅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也都走向了终结。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提出，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在内的相关学说，均已被西方意识形态彻底粉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结束，自由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

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使得网络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因而演变为“网络意识形态终结论”。尼葛洛庞蒂揭示了网络传播的全新特征，指出现实社会的物理边界在网络空间已经消失，无边无界的网络世界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当自由成为一种网络信念时，它就取消了一切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可能。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文明对抗将取代政治对抗、军事对抗成为未来国际对抗的主要形式，未来国际格局将取决于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对比。在具有决定性的八大文明体中，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代表，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将成为反对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这一思想显然闪动着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魅影。奥巴马执政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大棋局论”，意图压制欧亚大陆来维护美国霸权。在美国和日本联盟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中国被紧紧限制为地区性强国。事实上，无论就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还是就网络时代的现实而言，在网络文化传播中，意识形态绝没有终结。在信息技术推动网络“地球村”的变革中，全球空间利益盘根错节，激发了学者们对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思辨。因此，网络空间是地缘政治向网络政治延伸的新阵地，是当今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决胜地带。

国内学界或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或从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进程中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与教训、创新与发展问题。代表作有1993年俞吾金《意识形态论》；2000年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近年来又有文化安全的研究，如2010年涂成林等人的《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较

少。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从当下计算机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现实出发,研究信息条件下全社会普遍的网络文化境遇,以期拓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时间、空间纬度。

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法,批判分析德国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瑞典地理学家谢伦(Rudolf Kjellen)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生存空间论,研究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生存的可能性问题。拉采尔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如果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持续缩小,则意味着其国家力量在国际空间的衰退。依据“生存空间论”的分析视角,本书提出,当前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面临政治空间转移的问题。从地缘空间向网络空间的拓展,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守主阵地的必然要求。然而,在空间转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需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规律。同时,在研究中力求去除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达尔文主义迷思,将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目标从“不断扩张说”转变为网络冲突中的自卫与抵御、网络互动中的依存与发展的“网络主权论”。

本书运用“历史—文化”的二元分析模式,论证网络时代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现实已然不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血缘也有区别。不同于革命斗争高潮时期的政治形势,全球范围的网络发展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因此,本书试图将意识形态的研究主题从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转向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斗争,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发展方向与网络建设策略。

四、研究框架

在网络政治学的语境中,诠释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安全的独特规律,指出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的争斗异常激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重点探讨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方略。著作分五章。

第一章——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沿承。第一节，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第二节，总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第三节，阐述了以葛兰西、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第二章——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新特征。意识形态领导权涵盖对包括社会政治信仰、社会道德秩序、民族精神等一切社会价值观念的引领。第一节，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生长的新特点。本节首先论证，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终结。一是在网络平台的建设中，渗透着发明、设计、推广、引进等各阶段、各方面的参与者的主体思想，这些思想作为先在的意识形态物化于网络平台之中。二是在网络社会的演进中，利益差别、阶级差别依然存在，意识形态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空间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生长提供独特的地理环境。在生长方式上，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空间中一般采用思想统治的方式，而在网络空间中，通过非强制性的文化认同来获得普遍的支持，已成为意识形态生长的主要方式；在生长资源上，意识形态更加依赖于网络及网络技术，其网络优势的获得与网络语言的普及和网络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具有技术性；在生长区间上，意识形态在网络中不再受到民族、国家边界的局限，网络伸展到哪里，意识形态就传播到哪里，体现出广延性的特点。第二节，论述了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卫的新特征。网络意识形态威胁具有多元性，攻防具有非对称性，影响具有广泛性，发展具有动态性。第三节，总结了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力的新等级。由网络意识形态领导力的影响因子、广度指标、深度指标综合评定。

第三章——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略价值。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应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政治安全的基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第一节，阐述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国家利益中的全局价值。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国家生存、国家发展和国家稳定。第二节，论述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政治安全中的核心价值，地缘政治向网络空间的延伸，网络政治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网络空间中，确保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三大条件是完整的信息主权、充足的生长空间以及绝大多数网民的支持。第三节，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文化发展中的长远价值。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价值的选择、文化思潮的博弈。

第四章——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网络技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新的手段，但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首先，技术异化的形成。在网络空间中，在强大的网络技术的作用下，人们超越了各种文化的、政治的差异，纷纷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在同样的信息环境下看与听、发言与议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渐趋一致，他们的意愿、情绪、欲望逐渐被纳入同样的模式中。技术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技术控制下单向度的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的内涵出现缺失。其次，技术差距的扩大。互联网所使用的语言、技术都来自美国，在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政策支持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在网络语言、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的多种优势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肆征略新的“网络殖民地”，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失去他们的信息主动权。第三，社会沟壑的加深。网络技术的不均衡发展把人群化分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穷困者，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民无法享受网络文化，导致社会底层文化的弱化，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分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地位的危机，导致网民民族认同感淡化，民族自信心减弱；民族价值观陷于迷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度下降。

网络信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首先，信息壁垒的消解。牢固的信息边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跨界流动增加了信息边疆的守护难度，借助境外服务器，它可以轻松突破政府控制，成为转载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工具。其次，信息中心的消失。前网络媒体时代，政府凭借一系列的行政方式，就可以树立稳固的信息中心。而网络话语没有绝对的中心，个体抛开了身份、背景、地位等外在因素，平等地发表各自的意见。互联网上没有真正的权力中心，各种思想的碰撞异常激烈，导致网络文化的“无政府”。第三，信息控制的失灵。网上的信息难以追查其真实来源和核实其可靠程度，网络信息传播的自由性、匿名性削弱了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能力，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为一些别有用心组织或势力所利用。

网络传媒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首先，网络论坛、网络博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从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三个构成要素的典型特征看，网络论坛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

只能看作一种“有限公共领域”形态。“有限公共性”所暴露的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空间的失控、公共议题的多元化则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冲击。在网络论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有效进行意识形态引导,是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其次,网络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本质上是现实交际的物质化。网络语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都有可能反映到网络语言中来。因而网络语言的戏谑、实用、直观、群体、批判等一系列表征均有其特定的符号意义,其实质是通过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权威、信仰、秩序等的颠覆与离析,施行符号领域的意义操纵。为此,马克思主义应进行文化抵御,改善意识形态表达手段及运作方式,推进大众化转型。

网络思潮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冲击。宽松的网络环境在促进思想更加活跃的同时,也方便了一些杂音、噪音的制造和传播。一方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仍占据重要地位,强国论坛、乌有之乡等舆论喉舌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反主流倾向的各种思潮也兴盛于网络。首先,自由主义。各种反华势力在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幌子下传播对立思想和负面情绪,破坏执政党形象,进行颠覆、分裂祖国的活动;一些民族分裂组织也积极兴办网站,其制造的大量政治谣言可迅速通过互联网进入境内。其次,恐怖主义。世界恐怖组织利用网络遥控指使全球各地的恐怖分子,传播网络恐怖主义。第三,虚无主义。网络文学、网络音乐提倡漫游式、开放式创作,倡导虚无主义生活方式。第四,游戏主义。网络游戏弥漫着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元素,无原则地迎合个体的心理欲求,传递着游戏主义的人生观。第五,消费主义。体现消费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在网络中大量上市,世俗化欲望和物质追求对网民施行一种文化控制,使其成为被动、低俗的消费者。

第五章——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策略。本章是重点和难点所在。第一节,论述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方略的确立原则。坚持网络交流中的开放性原则;坚持网络冲突中的自主性原则;坚持网络发展中的正当性原则。第二节,探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机制的建构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应综合运用国家和民族的各方力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体系进行全局性筹划。在纵向上,从中央、省、市到县,各级政府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网站建设,做到统筹管理,逐级衔接,协调配合。在横向上,重点建设四大领导机制。一是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通过对网络信息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对形形色色的

信息渠道及其流动趋势进行早期把握,对其可能导致的威胁、灾难性后果进行科学分析,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而准确地做出预告。加强对信息源和网络服务供应商的管制,实行网络信息风险评估,推行安全等级保护。二是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制定相应的紧急处置预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和经济等安全管理手段,对流转于网络中的非主流观点、言论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进行鉴别,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卫机制。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反渗透功能,其根本在于提升它的自卫能力。这就要求它“面向文化前沿,兼容并蓄地吸收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的成分,以中西文化精髓的升华,成就自身的文化高度”。^①同时,它应转向关注民众的生活实践,并从中获得日常话语,拓展自身的文化广度。进而融汇正向的网络心理,争取更大范围的网络认同,获取更为丰富的文化能量,从而“以更丰富的文化意义、更具融合力的日常话语、更具创新内涵的文化力创造自身的文化优势”。^②四是红色文化的抵御机制。其一是培养网络接班人。对大学生及其他青年人开展红色教育,以更为生活化的主题、更为日常化的方式,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在以理服人,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并使之在网络媒体中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其二是占领网络阵地。“电子政党、网络教会、网上学校等网络社团及各种网络传媒,包括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网络视频、网络广播等,总合在一起构成网络阵地。”^③以红歌、红剧、红舞等多样化主题扩大红色网站的影响,引导网络阵地的红色化。其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网络文化,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化、产业联盟化,不断拓展网络阵地,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① 杨文华.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

② 同①.

③ 同①.